

论马克思就业理论的发展

宁光杰

摘要: 马克思就业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工资理论、补偿理论的争论、失业理论、劳动分工和劳动力市场理论等几方面的分析, 本文对这些理论做了具体介绍, 并给出了恰当的评价。

关键词: 工资 补偿理论 失业 劳动分工 劳动力市场

马克思的就业理论以资本有机构成成为核心, 包含了技术变动、工资、劳动分工、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等几个方面, 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以后的经济学者继续在就业理论领域进行探索, 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原有的就业理论, 虽然有些学者在理解马克思理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偏颇。

一、工资理论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供求具有特殊的制度特征, 那么工资的决定也应与传统理论不同, “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 不是工人人口绝对量的变动, 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 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 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工资是由在职劳动的供求决定的, 而在在职劳动或劳动者的数量又是由资本家单方确定的, 对劳动的需求不同于对劳动力的需求, 前者的增加不会必然导致后者的增加, 在职工人的供给受资本的控制, 因而工资仍受资本家控制。失业人口的增加会对在职工人形成外在的压力, 促使工资下降。而工资的上升却是很少发生, 幅度也是有限的。即使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积累的扩大使对劳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 以至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 那么, 工资就会提高, ……但是, 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 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 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批评了古典经济学中认为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的观点, 工资并没有调节人口增减以适应资本积累的作用, 它在特殊的生产部门中可能成立, 而整个社会总劳动力与总资本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战后以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西方国家的工资做了新的分析。他们认为实际工资的降低(1977-1995 年美国生产工人税后实际收入下降 14%。Nilsson, 1999), 使得利润增大, 有利于增加就业和产出, 这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新经济出现低失业率的原因。关于实际工资下降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和争议, 而影响工资差异的因素主要是谈判能力的不同, 技能高低并不能解释全部 (Burkett, 1998; Nilsson,

1999)。工资中除了来自雇主的部分, 还有来自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的部分(社会性工资), 虽然社会性工资数量在战后不断增加, 但工人对雇主的工资依赖仍旧很高 (Nilsson, 1997)。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要考虑劳资关系, 劳资双方的利益协调比单纯依赖市场保持的灵活性对解决失业问题的作用更大。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工资理论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实际工资的下降导致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利益发生倾斜, 支撑了资本家的扩大投资。这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的观点, 工资运动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 它要支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基本制度, 并不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因素单独决定的。

二、技术进步、补偿理论及失业

关于补偿理论的问题, 霍华德和金 (M. C. Howard, J. E. King) 两位经济学家认为, 马克思从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来论证失业后备军产生的必然性, 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忽略了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反作用, 有机构成提高必然伴随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这会加速资本积累, 从而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究竟哪种力量更大并不能肯定, 因而关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净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二是根本没有论述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问题。失业只有在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超过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时才会产生。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 如果没有劳动力供给的更快增长, 也不会有失业。

霍华德和金对补偿理论的分析是一种相对短期的分析, 它反映的追加投资来源于由于采用先进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其补偿效果如何, 则取决于投资量的大小。让我们用图形分析一下。如图 1 所示, A 点为发生技术变动前的等产量线与预算线的相切点, 发生技术变动后, 技术组合由 A 移到 B, 产量仍为 U_0 , 这种技术是节约劳动型的, 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由 OL_1 降为 OL_2 , 但同时, 采用新技术的厂商由于预期到会有更高的利润率或更大的利润, 与其他厂商相比更“富有”, 因而愿意比原来多生产产品, 产出的扩大同时带动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首先移动的是预算线, 它与原来的预算线平行, 产出的增加意味着等产量线从 U_0 移到 U_1 , 这

时的最优选择为C点,此时劳动力需求增加,不仅补偿了 $OL_1 - OL_2$,而且超过原有的 OL_1 水平,为 OL_3 。通过图1可以看出决定技术进步最终是否减少就业量的关键在于产出增加的规模,只有产出增加足够大,能够补偿所减少的劳动需求,技术进步才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而这里我们的前提是节约劳动的技术的采用与扩大产出是同时进行的,不存在时间上的滞后。但在霍华德和金的分析中要等到产生超额剩余价值以后,再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进行再投资以增加劳动需求。现实中可能更像霍华德等分析的那样,采取技术的同时,产出并不增加,因为在技术带来的收益存在着不确定时,厂商不敢盲目扩大生产。此外,投资的扩大也要受产品需求的制约。如果是这样的话,技术的采用就会首先降低劳动需求,造成一部分人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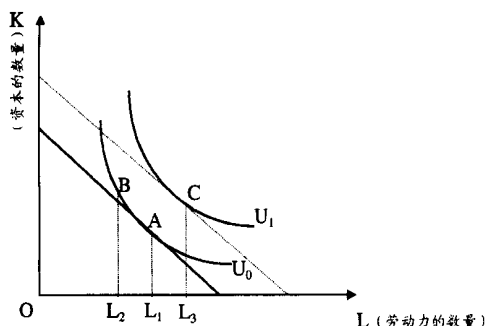


图1 节约劳动的技术与投资扩大: 对劳动力需求的最终影响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揭示的是失业存在的根源和趋势,其贡献在于找到了支配长期就业变动趋势的一个重要变量——资本有机构成。研究的重点不是某一时期的失业数量,因而霍华德和金的批评有些不得要领。如果我们把他们的研究期间再延长,就会发现即使补偿理论真的实现,但随着过剩人口的减少,劳动力价格会上升,结果导致利润率的降低,资本家必然还要采取节约劳动的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又会出现新的“补偿”问题。但是霍华德和金对技术进步提高后确定失业量的具体分析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费恩伯格等人(Feenberg, 1991)则认为技术不是中性的,必须在社会背景下定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必然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至于霍华德和金提出的要注重分析劳动力供给减少对失业的作用,确实有实际意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差异是很大的,但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劳动力供给是过度膨胀:女工、童工的使用很普遍,从农业部门不断游离出剩余劳动力。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有历史的局限性。虽然劳动力供给在其他时代并不过剩,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规律仍会起作用。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厂商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除了节省活劳动外,也要尽可能节省资本的使用和耗费。节约资本固然可以在规模经济中直接产生,但也需要有一种技术来实现。马克思的资本有

机构成公式可以写成: $c/v = c/(v+m) \times (v+m)/v$ 其中 $c/(v+m)$ 即资本产出比率,它是资本生产率的倒数, $(v+m)/v$ 为劳动生产率。所以反映技术进步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动实际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来决定的。若一种技术既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提高资本生产率,则其对就业需求的影响就取决于两者的力量对比。英国1948-1984年期间,办公数据处理设备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都增长,但就业量却有缓慢上升;劳动生产率增长但资本生产率下降的部门,如钢铁、采矿、机械部门,它们的就业量出现下降(Patel, Soete, 1987)。此外,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不仅限于现有的企业和产业部门。第一,技术变革和机器的应用,会引起制造机器和有关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规模扩大,从而增加这些部门的就业量。第二,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会使产品价格下降,这会有助于产品需求的上升,也会为增雇工人创造条件。但这些有利因素是否足够补偿技术排挤的工人数量仍要结合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以上我们对技术的分析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长期中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充分替代的,对于任何数量的产出都有两者任意组合的可行的技术存在。实际上这一前提并不与现实相符,首先技术的可得性会给替代造成一定的阻碍,技术的产生、应用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可能存在随手可得的技术。其次,更重要的是,技术的更新受到原有资本劳动比例关系的制约,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局部进行改良,因而一般不可能自由地采用任意的资本劳动比例的技术。换句话说,企业的技术发展也存在着“路径依赖”。考虑到这些因素,技术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又会大打折扣。

技术变动与失业的关系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对马克思的周期性失业理论作了发展,他将失业的原因归结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利润率下降,而后者又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扩张阶段后期,投资过剩从供给方面起作用,通过工资上升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使生产成本提高,同时消费不足从需求方面起作用,限制了商品价格的相应上涨。换句话说,繁荣时期,工资的上升引起工资占收入份额的上升和资本份额的相应下降。在繁荣的后期,利润率的下降降低了人们的预期,经济从繁荣走向停滞,失业人口增加。尔后,又会开始新一轮循环。其中,谢尔曼引用了格尔恩(Glyn)和苏特尼费(Sutcliffe)等学者的观点,分析了工资的上升与工会斗争有关。随着经济的膨胀,在扩张的后期,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者减少,工会的谈判能力增强,因而工资有可能提高。这样的分析给人的感觉是工资挤压利润造成周期性失业。其实不然,谢尔曼认为工资份额的上升只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虽然工资在利润达到最高点前就上升,但上升速度慢于利润的增长速度,在利润达到最高点之前,工资的份额是下降的,直到利润开始下降以后,工资的份额才上升。而利润的下降又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主要有要素价格的上升、需求不足。工资上升在其中起作用,但作用不大。谢尔曼承认马克思的分析是长期趋势分析,但他将其理解为长周期,因而对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仍显

不足,但在周期性失业方面的研究,的确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戈登对自然失业率理论进行创新,他批评了新古典关于自然失业率的假说,强调自然失业率可以变化,因而不是合理的,它是制度造成的。资产阶级用自然失业率的永久存在来掩盖剥削,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如果自然失业率长期存在并不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就成为正常现象,政府以及企业就没有义务为降低失业率而做出努力。从历史发展来看,自然失业率也是可以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却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实际情况是当工人运动高涨、工资得到应有的提高时,自然失业率就会上升;反之,工人运动下滑、实际工资下降时,自然失业率就会下降,但不幸的是工人并没有从失业率的下降中得到好处。

三、分工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技术进步不仅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产生影响,而且还对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劳动力的素质乃至身心都会产生影响。马克思在工人与机器的斗争中也曾提到这些问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布雷弗曼和戈登对技术发展、劳动分工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生的质变作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丰富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布雷弗曼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的副标题就是“20世纪中劳动的退化”,它暗示了技术进步、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技能简单化,人们长期被束缚在只有细小操作的工作中,对工作产生厌倦,身心受到损害,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布雷弗曼从管理的起源说起,认为管理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工人的控制。有了管理,就有了对劳动的分工,这会达到提高生产率的效果,也能降低雇佣劳动的成本(巴贝奇),可见,分工既有其技术上的需要(生产率的提高),也有社会方面的需要(降低工资成本)。随着技术的应用,分工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技术的应用也被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成为其攫取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布雷弗曼谈到,“机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资本故意地挫伤了,而不是发展了。”只有对资本家有利的可能性,资本家才乐于将其转化为现实,机器可以替代组织手段、纪律手段的性质会得到发挥与应用,而最先进的、对社会福利最大的机器却未必会被采用。虽然技术得到应用,但大多数工人的技能水平是下降的,只是作为简单的操作工人而存在。只有少数人控制着先进的技术,他们成为企业的领导层。而分工的细化又加强了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使其不敢轻易辞职,否则,就会面临失业的威胁。

分工和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工人内部的职业结构: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办公室人员增多。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人的地位上升,也不意味着工人内部出现了分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受资本的控制,尤其是很多岗位由妇女从事,其工资甚至低于工厂中的蓝领。他们的出现只说明是为了适应分工细化的需要,管理部门本身也成为劳动过程,也需要控制。此外,布雷弗曼也分析了社会分工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社会分工同样得到细化,它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对工人潜能的束缚。

实际上,技术与分工不可能不对就业的数量产生影响,这种数量也更多地体现在数量的结构方面。例如,“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发展最迅速的大量职业部门是与科学技术关系最少的那些部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而是为了减少从属于它的工人的数目。”这种看法与有机构成提高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吻合的,对所谓的补偿理论却是一个反击。此外,如上所述,分工使工人的技能受局限,也会影响他在其他部门的就业,这使结构性失业和不匹配现象增多。

如果说布雷弗曼主要分析了技术的变动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虽然他也将技术的变动看作是内生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那么,戈登则试图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侧重分析各种制度对劳动力的同质或分化的影响。作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ASS)的主要代表人物,戈登把经济活动的长波、积累的社会结构、劳动组织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三方面结合起来,来分析美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演变。这样,每一个长波都与特定的社会积累结构相联系,在上升阶段,有适应积累的制度环境、稳定的投资环境和利润预期。随着有利于积累的机会逐渐耗尽,积累会放慢,原有的积累社会结构变得过时,将被新的积累社会结构所代替。而劳动过程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也有生命周期:开始于前一长波的下降阶段,成熟于长波的上升阶段,衰败于长波的下降阶段,同时,新的积累社会结构开始运行。

在这一理论框架的支持下,戈登将美国劳动力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20年到19世纪末,它的特征是: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劳动供给成分的多元化,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没发生根本变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仍有控制能力,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未形成。第二阶段从187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是劳动力的均质化阶段,它的背景是科技的应用使企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也加强了对工人劳动的控制,监督管理部门迅速膨胀,企业对工人技艺的依赖下降,劳动趋于简单化,工人之间的技艺差别缩小,半技术工人比重扩大,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形成。第三个阶段是劳动力的分割阶段,它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其基本特点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分为头等市场和次等市场。头等市场上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高,多为管理和技术人员,平均收入高,就业稳定,解雇率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相对较弱,以资本与工会的合作为主。次等市场上的劳动力大多是半技术、粗工,他们收入低,就业不稳定,解雇率和流动率较高。企业内部控制较强,以机械化和监工为特征。同时,头等劳动力市场内部也出现了分割,其中又分为独立头等市场和从属头等市场。前者的劳动者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在企业中处于中层以上;后者的劳动者为半技术的蓝领和白领。

通过三阶段的分析,戈登说明目前美国工人阶级在分裂,差距在拉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工人生产过程所经历的客观分工和特定的制度结构。如同历史上出现的“同化”是为了加强对劳动的控制一样,劳动的分割也是为了满

足资本家攫取利润的需要。在戈登的第三阶段分析中,工人不是被动地接受资本家的分工和管理,而是组织起来获得一定的权力,因而工会的作用就不容忽视。从上面布雷弗曼的观点可以看出,他认为工人存在着同化的趋势:技能下降,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缩小,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类似于戈登的第二阶段中工人的状况。这可能与布雷弗曼的著作完成年代较早有关,也与他的方法论有关。在布雷弗曼看来,他并不接受“新工人阶级”这样的概念,他“必须加以研究的是整个阶级,而不是从这个阶级中任意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使他没有对劳动分割这个重要的制度性变化给以足够的关注。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就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它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次等市场的工人即使技能得到提高,也很难被头等市场所雇佣,因为市场的分割意味着有垄断存在。这就使就业与失业的结构性矛盾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它使工人阶级的差距拉大,共同利益弱化,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团结。

劳动力市场结构分析比单纯的市场摩擦、摩擦性失业分析又前进了一步,更为可贵的是戈登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与经济的长波联系起来,这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作用,只有合宜的市场制度结构才能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同时,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与结构性失业相连,而周期性失业则受经济波动影响,这也在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之间架起了桥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的就业理论。

此外,阿德尔(Adler)提出要分阶段分析技术变化对劳动过程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的自动化使得工人技术升级,70-80年代的技术发展如布雷弗曼所言导致工人技能下降,而80年代中期以后,技术发展又提高了工人的技能。此外汤普逊(Thompson)在《工作的性质:关于劳动过程争论的介绍》一书中也对布雷弗曼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对技能、工人组织的成分的界定有问题,并且没有考虑劳动市场的影响。对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现实也有大量的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它有利于提高生产率(Doucoulagos, 1997; Buchele, Christiansen, 1999),也有的学者认为工人参与管理是资本对劳动进行控制的更灵活的形式(Gunn, 1994)。

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分析还包括内部劳动力市场,它是企业在自身利益的考虑下和内部职工的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不利于失业问题的解决。内部劳动力市场能够解释劳动时间延长(内部人)与失业(外部人)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了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是存在的事实,但并没有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严重,也“不一定就说明阶级特点的衰退”(皮尔森, 1999)。

四、总结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强调了制度性因素是影响就业问题的主要因素。它在当代仍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就业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以资本积累进程中的工资和

利润变化为核心,它反映着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用它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和失业。战后正是劳资双方的力量消长,使得实际工资发生变化,进而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以及失业率的高低。在失业理论方面,需要深入研究技术变革尤其是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对失业产生的影响。同样,劳动力市场和失业问题不能脱离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要研究劳动过程中劳动组织、劳动分工的作用。在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方面,要研究劳动者内部的分化,以发展马克思的就业理论。劳动者内部分化虽然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但不是起支配作用的力量。

注释: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699、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例如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可以通过加强在职工人的剥削,增加工时来实现,这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增加。

这里没有要素价格的变动,是常态下技术变动规律,因而不涉及替代效应的分析。

Howard J. Sheman, 1991. The Business Cycle: Growth and Crisis Under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23~224, 228

参见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参考文献:

1.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中文版,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3.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P. S. Adler, 1992 ed.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Buchele, Christiansen, 1999. Labor Relat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1(1).
6. P. Burkett, 1998. Insiders and Outsiders, Unemployment and Worktim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0(3).
7. Doucouliagos, 1997. Comparativ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of Labor-Managed and Capital-Managed Firm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9(1).
8. Gordon, D.M., Edwards, R.C. and Reich, M.,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C. Gunn, 1994.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Capital's Flexible System of Control.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6(3).
10. K. Lang, J. S. Leonard, 1987. Unemployment &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 Basil Blackwell.
11. E. A. Nilsson, 1999. Trends in Compensation for Production Workers: 1948-1995.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1(4).
12. E. A. Nilsson, 1997. Wage Dependence in the Postwar U.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9(3).
13. M. C. Sawyer, 1989. The Challenge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Harvester Wheatsheaf.
14. H. J. Sheman, 1991. The Business Cycle: Growth and Crisis Under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5. H. J. Sheman, 1990. Cyclical Behavior of the Labor Shar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2(2-3).
16. P. Thompson, 1989. The Nature of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Debates on the Labor Process.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N)